

论《瓦西里·菲维伊斯基的一生》的话语特征与作者形象

何雨韬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州 510420)

提 要: 完成于 1903 年的《瓦西里·菲维伊斯基的一生》被高尔基赞为安德列耶夫最深刻、明朗、严肃的作品, 柯罗连科也称其“艺术风格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具有很大的力量”。安德列耶夫以细腻深刻的笔触, 描绘了世纪之交独特的俄国乡村世界: 工业文明冲击了传统的东正教信仰, 上帝对人们的祈求保持沉默, 异己之物窥视着包围了困顿中的民众, 小说主人公的绝望呼告成为一股直击心灵的人类之声。作者通过对话语、叙事、情节等文本要素的选择表达了存在主义的哲思, 小说借助现实主义与神秘主义元素的综合使用, 不但对宗教的慰藉提出质疑, 而且预告了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关键词: 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 安德列耶夫; 作者形象; 维诺格拉多夫; 巴赫金

中图分类号: I512.06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安德列耶夫(Леонид Николаевич Андреев, 1871—1919)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罗斯文坛上的重要作家, 曾被高尔基称为“世纪之交欧美两大洲最有趣”和“最有才华的作家”。他于 1903 年创作的中篇小说《瓦西里·菲维伊斯基的一生》(Жизнь Василия Фивейского)讲述了俄国一位乡间神父的遭遇: 神父的长子溺亡, 次子生来白痴, 因火灾失去了酗酒的妻子和几乎所有财产。瓦西里神父长期背负厄运, 面对教民的告解也深感无力, 最终在抢救一位农民失败后心力交瘁, 猝死在离开教堂的路上。作品以神父的命运影射了世纪之交俄国动荡的社会现实, 聚焦了主人公从盲信到觉悟的过程。因此, 高尔基认为安德列耶夫“从来没有写过比这更好——更深刻、更明朗、更严肃的作品”, 柯罗连科也肯定该作“艺术风格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具有很大的力量”(卢兆泉 1992: 69)。

鲁迅早在 20 世纪初便译介了安德列耶夫, 称他为“俄国当世文人之着者”, 其作品“神秘幽深, 自成一家”。此后, 研究者们探讨了作家的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归属, 分析了他作品中的表现主义、印象主义及宗教元素, 开展了其与鲁迅诗学及中国文艺作品的跨文化比较。然而, 如李建刚在 2013 年的论文《列·安德列耶夫研究及其现实意义》中所述, 国内的安德列耶夫研究还不够系统, 尚未涉及作家个性、哲思与创作风格的关系(李建刚 2013: 67)。

俄罗斯著名文学修辞学家维诺格拉多夫提出的“作者形象”理论则为此提供了解决路径。维诺格拉多夫区分了创作文本时的作者与现实生活中的作家本人, 认为作者形象是连接现实世界、文本与真实作者的交汇点, 促成了作品布局形式、语义和审美的统一(Виноградов, 1963: 65)。而这种统一依赖于文本中话语的有规律组合——正是话语完成了语层的组建和形象的塑造, 保证了叙事视角的达成, 在作者形象的形成和解析中起到重要作用。

2 多重对话话语中的存在焦虑

维诺格拉多夫大量研究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包括普希金、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叶赛宁、阿赫玛托娃等人的著作,发现统摄整部文学作品的灵魂是“作者形象”,即通过作品文辞、形象、涵义、叙事等要素反映出的作者情志、观点、性格等特征。其中,作品的叙事结构是作者形象的一类关键表现形式,被维诺格拉多夫称为作者创作时的“面具”(王加兴 1995: 2)。《瓦西里·菲维伊斯基的一生》通篇以第三人称撰写,叙述者没有展现出明显的个性化特征,因此可以认为,该文中的叙述者基本等同于作者形象。

作者形象包含了几个渐进的层次:本中的话语有规律啮合,形成以语法、构词、语体风格等方面特征相互区别的话语序列;各样态序列组成客观的语层,经由读者的主观认识,构成形象层和叙事结构;这些层次综合起来,得以通向作品的情感、涵义层。安德烈耶夫在塑造人物时,使用了大量细腻入微的心理描写,人物话语的直接引用相对较少。然而正是这些占比较少的对话言语,在叙述者对人物旁观式的侧写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因此,它们可以作为作者形象剖析的切入点。

根据人物言语的发出者、接收者及内容,可以将文中的人物对话分为三类:

首先是人物与人物的对话。这类对话多是为了推动情节发展、表现人物性格。例如神父的小女儿说“我谁都不爱。”,神父笑答“跟我一样!”(安德烈耶夫 1984: 131)¹;又如执事对神父的预言——“你记住我的话:这个神父迟早要出事儿。”(171)

其次是人物与上帝的对话。尽管发出者迫切想要得到回应,但这是一类单向的对话,表现为信徒对上帝的立誓追随、忏悔、祈愿,甚至是诘问。以瓦西里神父与上帝的对话为例,故事开头的神父对上帝有着虔诚的信仰,数次伏在地上,高呼“我——信仰你。”(102);随着神父渐渐意识到自己作为上帝的使者,面对教民们的苦难却无能为力,他忍不住愤怒地质问上帝“可你却无动于中!无动于中!你还算什么……”(146);正当他深陷对上帝的质疑时,他在火灾中失去了家和妻子,不得不再次屈于对方的“试炼”,在妻子的遗体面前惊恐地大喊“不!不!我信仰你。你是正确的。我信仰你。”,甚至于急表虔敬,从话里去掉了“我”字,脸贴着地板上的尘土、谦卑地高喊“信仰你!”(164);这之后的瓦西里神父重拾信仰,每日凌晨冒着大雪去教堂做弥撒,试图在一种极端和边缘的处境中接近上帝,却仍然以失败告终——他在农民莫夏金的葬礼上感到上帝之力降临于身,于是对其大喝“我吩咐你:起来!”(206),那具终生受苦、意外暴毙的死尸却不予回应,这时的神父心灰意冷,用平静的语气对上帝发出了最后的“威胁”:

“你存心骗我吗?……在我一生中,你为什么始终把我囚禁在桎梏之中,当作俘虏和奴仆一般役使呢?不让我自由地思想?不让我自由地孕育感情!不让我自由地叹息!一切都要听你的驱使,一切都为了你。为了你一个!既然如此,你就显现吧,我等着!”(207)

可以看出,瓦西里神父与上帝的对话言语始终围绕同一主旨,却经历了感情上的巨大变动。这一串单向的话语构成了链条,成为文本情节发展的线索,展示了主人公信仰动摇的过程。

第三类是看似是人物与人物,实则是人物与上帝的对话。对话尽管在不同角色之间展开,究其内容而言,却是对更高之物的提问。例如,因长子溺死、次子是白痴而每日借酒浇愁的神父妻子,在自杀失败后怯怯地问神父“现在我却连死也怕了……瓦夏,亲爱的,这可叫我怎么办?再去……喝酒?”(144);又如,神父对害死幼女的流氓厉声吼道“你究竟是什么东西,你说呀!……你的上帝在哪里?他为什么要抛弃你?”(154)。此时,人物们已不能指望在对话者身上获得正确的答案,却又因为上帝的缺席,不得不对周围的人发出呼告,这与第二类对话的单向性是一致的。

此外,《瓦西里·菲维伊斯基的一生》中还包含了一类特殊的对话——瓦西里神父身上两个自我的分裂式“对话”。由于发生场所的特殊性,这类对话并不以引语的形式直接呈现,但却潜隐在叙述者对神父的心理描写之中,实质上是神父对另一个自我施加的暗示。他早已察觉到信仰是一场具有欺骗性质的幻想,因此在即将叛神之际他最后一次选择上帝,试图把苦难视作试炼、把混乱视作神迹的前兆:

(神父手中握着雏鸡)“难道我不也是在上帝的手心中吗?……我怎么敢于不相信主的恩佑呢。”(168)

(神父)身内有什么东西已分裂为二;份佛他正在静候着什么人的声音、指令或者正在静候着赦宥罪愆的全能的心……(203)

这种分裂的根源与瓦西里·菲维伊斯基的神父身份和生活环境息息相关。世纪之交的俄国经济迟滞,沙皇统治与工人、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加重,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新文明打破了东正教传统对农村地区的控制。而安德列耶夫笔下的角色正面临着这种信仰的瓦解——神父本是传统基督教文化的守卫者,但即使这样的人也发现,基督教文化在真理面前已经软弱不堪了(塔塔里诺夫 2006: 285)。以瓦西里神父为代表的人们发现了东正教信仰的漏洞,却心找不到新的精神依靠,进而陷入了忧虑和混沌——“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了这个真理,都企待着这个真理,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用人类的语言来表达这个真理——这个关于上帝、关于人类、关于人生的神秘莫测的命运的巨大真理”(128)。

这种生存的焦虑在后两类对话中显得尤为明显。它们的话语内容比第一类更深刻,因为蕴含了人物们对高于自己肉身和世俗生活的真理的追问。类似的角色话语总量低于对心理、环境的描写,却常常重复、回环,让人印象深刻。从手法上说,这是作者力求用短短的、但重重的话语传达出人物的存在困境,和被困境吞噬而致的巨大惶恐和绝望,以竭力调动读者的反应。从内容上说,这种重复和回环是必然,是人类普遍面对的存在主义问题。

3 叙事话语中的“异己之物”

除了人物的话语之外,《瓦西里·菲维伊斯基的一生》中还有一类特别的声响——它们的发出者不是人类,没有肉体,也难以确认是否有意识或思想。于主人公而言,它们是难以捉摸的隐形敌人,是“异己之物”,表现为作者笔下的“幻影”“幽灵”“夜”“教堂上方一大片毛茸茸的铁灰色的东西”等一系列抽象形象。这些异物不是上帝,无法对教民们的呼告作出回应,却或窸窣着,或尖叫着,包围了这些困苦的人们:

黑夜的那群幽灵正在匆匆地来回走着,悄无声息地团团围住了瓦西里神父。它们疯狂地嚎啕大哭着,伸出一双双无力手,祈求着怜悯、宽恕和真理。(145)

某件巨大的东西迫近了。它终于破门而入,站在那里,用空虚的、包容一切的目光审视着他们俩,——这东西象空虚一般广漠,象永恒的死寂一般可怖。(156)

夜又尖叫着扑向(仅坐着神父和白痴两个人的)房子,钻进烟囱,满怀难以餍足的仇恨和忧郁,发出凄厉的悲鸣,哄骗人说:它没有子女了,它把子女吃掉了,把残骸埋在旷野里了,埋在旷野里了……簌簌声、窸窣声、呼啸声和口哨声……大笑声。夜在嬉闹……还一边唱着:给别人掘墓欧,给别人掘墓欧。(181)

这些异物的声响在乡间旷野上编织出了透明的牢笼,主人公们的祈求和呼救就成了其中唯一一股振聋发聩、直达心底的人类之声。安德列耶夫在文本中多次使用绝妙的比喻,以表现主义手法刻画了这种包围和人在其中的孤独感——神父在黑暗中祈祷时,周遭是萧瑟忧郁的氛围,嗓子“却清晰得像天火一样”(110);他倾听教民的忏悔时,意识到“期望”会带来痛苦,它不过是人类代代“用心脏汁水哺育成的、覆盖在生活上空的参天大树”(141);夜晚神父睡觉时,村民们一个个痛苦、奇异的梦魇则“连成了火带”,穿透了墙壁和门闩,从他的颅下穿过(142)。

如前文所言，文本中的形象以语层的语言特点为表征，指向作者创作时的情感、评价与思想。而这类超自然的神秘形象正位于创作者与主人公的情感联结点：1903 年的安德列耶夫和他的主人公们一样，生活在经济、政治、信仰危机重重的俄国，感到因生活动荡不幸产生的抑郁和痛苦，察觉到东正教信仰的根基已被动摇，俄国第一次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但他的一些主人公们似乎还在不自觉地期待着上帝的庇佑降临。安德列耶夫没有选择将这种情感完全社会政治化，将其塑造成阶级的仇敌，而是注重这种恐惧和忧虑的强烈性、共通性，因此他塑造出的形象是虚幻的、朦胧的，但却出现在所有人周围：故事结尾的葬礼场景中，“人人都感觉到了这昏暗，可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却没有一双肉眼看到这昏暗。只有那些一直盯着友好的槭树叶的人，才看到一大片毛茸茸的铁灰色的东西，从树后爬了过来，用死亡的眼睛望了望教堂里边，便朝上，向屋顶上的十字架爬去。”（201）

将感情、物体等非生物故意塑造成类生物是安德列耶夫创作中的特色手法，例如他早期的作品《沉默》（Молчание, 1900）、《谎言》（Ложь, 1901）、《深渊》（Бездна, 1902）。他偏好在对社会环境和各类人物的苦难进行现实刻画时，引入某种神秘的力量——上帝不在这里指引和救助俄罗斯人，此时幽暗的异物们趁虚而入，用希冀和幻想诱惑人类，让他们终生饱受苦难、最后一死了之（塔塔里诺夫 2006：280）。可以推测，现实主义元素和超现实技法的使用源于安德列耶夫对现实的深入思考，而神秘体验则与他本人消沉忧郁的性格不无关联。按维诺格拉多夫的“作者形象”理论，作者总是试图在现实生活、文本、作者本人之间找到恰当的切入点，建立一个合理研究范畴，探查文本布局内各构成要素的关系问题（李懿 2021：122）。因此，我们的下一步任务是沿着以上的话语、形象分析进一步勾勒作者形象，重回现实、文本、真实作者的交叉点，尝试着回答：《瓦西里·菲维伊斯基的一生》中呈现了怎样的作者声音和形象？

4 作者的直接在场与间接渗入

除维诺格拉多夫外，俄罗斯著名文艺理论家、思想家巴赫金也论及了作者形象问题：他反对“作者形象”这一术语，认为它将作为创作者的作家与文本中的角色形象同置于形象层，使其变成了文本内部因素（黄玫 2008：46）。实际上，“作者形象”中的“形象”一词，并不意味着它是真实作者的创造，而更多是一种隐喻——它是有审美思辨意识、生活经验感受的作家本人在其作品中的投影，是一类区别于主人公的特殊形象，位于文外和文内的衔接处。同样地，本节标题中的“作者之声”也是一种隐喻，它是在话语、形象、叙事、情节等要素中全部体现出的作者意图和意志。因此，作者之声实际上囊括了人物之声、“异物”之声，这一层次的分析高于前两层。我们可以从两条路径追溯作家留下的投影：捕捉带着角色面具的、在作品中直接出场的创作者；通过对话语、形象、叙事等要素的分析，挖掘作者渗入在文本中的语言意识、思想态度。

谈及带着角色面具出场的作者，需要关注一个特别的人物，即瓦西里神父的次子白痴瓦夏。长子夭逝后，神父的妻子因为思念过度陷入病态的偏执，苦苦哀求神父和她再生一子，以复活长子，而新生的孩子就是白痴。白痴不等同于叙述者，也不是作者在文中的化身，本不应该存在于世的他就是为了填补兄长的死亡被强行召来世上的怪灵。但这个明显失智的角色，却有两次关键的发声：

（失去妻子和房子后的神父）在屋中央站停下来，放开喉咙吼叫道：“上帝啊！我信仰你！信仰你！”……一阵狂笑声打破了寂静，猛击着神父的背部……白痴在笑。莫名其妙的不祥的狞笑，把他那张呆滞的大面具撕裂了开来，一直裂到耳根，从这道宽大的裂口里，不可遏止地冲出一阵莫名其妙的、跳跃不已的狂笑：“咕——咕——咕！咕——咕——咕！”（186）

（神父命令死去的农民莫夏金复活，却发现）棺材里的尸体没有了。却躺着白痴……一声象滚雷般的狂笑充满了寂静的教堂。（209）

既然他不具有和普通人一般的神智，那他的发声就不是个性化的，而是创作者的赋予，即，作者躲在白痴形象背后发出的声音。安德列耶夫借白痴之口，对瓦西里神父的“愚信”之举发出了嘲笑，笑声甚至震垮了教堂和荫蔽在教堂穹顶下摇摇欲坠的世界。这种作者之声正映证了作家眼中遭遇信仰危机的俄国环境，和他想要抛弃宗教式慰藉的决心。

然而，在揭示了危机之后，1903 年的安德列耶夫却暂时没有选择做主人公的救赎者。这种作者形象不仅在上述的话语和人物形象中得到了体现，还在《瓦西里·菲维伊斯基的一生》的叙事层中显现了出来。

本文的叙述者独立于故事外、位于主人公们上方，因此预先知道整个事件的走向，具有全知和限知交替的视角。视角的交替之中，叙述者的视角时而与人物齐平，用细腻入微的沉浸式心理描写传达其内心感受，例如，“神父妻子顿时觉得一切都被猛烈的旋风卷了起来，连灯火和黑暗也在飞舞，无数没有眼睛的幽灵从四面八方摇晃着身子，朝她扑来。”（122）；叙述者的视角时而又又是俯瞰式的，或对人物给予外部评价，说“（瓦西里神父）同别人是那样地格格不入，那样地孤僻乖戾，不可捉摸，以致大家都认为他并不是人，而是行尸走肉。（124）”，或对人物表示怜悯，似乎已经提前知道他们都处于一幕永恒的悲剧之中，例如他描述疯病发作时的神父妻子：“这孤零零的呼救声是极度悲戚的，令人毛骨悚然，而且是徒劳的，谁也不会来救援她。”（123）

但除开白痴那两次意味深长的狂笑之外，全知的叙述者自始至终没将主人公们的行径形容为下流的、愚昧的，也没有塑造作为典范的正面角色，为人物和读者们指明一条可以走向光明的正直道路。在他笔下，酗酒成瘾的神父妻子“被灼热的希望烧得分外漂亮又分外丑陋”（108）；执事波尔菲雷奇坚定于自己的信仰，却闹不明白为何死神找上了门，让他心神不宁、“连起码的待人接物的礼节都忘了”（194）。最为典型的还是叙述者对瓦西里神父的态度：对这位复活尸体失败后弃教堂而去的神父，安德列耶夫既没有说他勇敢，也不大肆批斗他的蒙昧，只说他死在了宽又平坦的大路中央，保留着撒腿狂奔的样子，“仿佛他虽然死了，人却还在奔跑”（211）。在瓦西里·菲维伊斯基所在的世界里，安德列耶夫虽是手握权力的创造者，却没有给出生活的指示，只是说明了彼时俄国乡村里那批教民的混沌和挣扎，并绝不轻视这种挣扎的痛苦和悲剧性。

这种刻意的保留可与第二节中的异己之物联系起来——安德列耶夫在数个作品中都刻画了神秘幽深的暗物。既然阴暗面的物质存在，又如何能完全否定作为光明一面的更高存在是虚构的呢？如何能找到一条道路击退这些阴暗，同时又不耽于飘渺的期望和等待，过上幸福踏实的人生？《瓦西里·菲维伊斯基的一生》整个故事都在宗教文化的语境中进行：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神父，事件的时间线全部以宗教节日为节点，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 1903 年的安德列耶夫尚在寻神派和无神论之间动摇。他反对将人生中生与死、善与恶这样的重大选择完全交付给靠不住的“上帝”，但他并没有写出人战胜异己、开辟新道路的具体路径。

按照维诺格拉多夫的观点，文学作品话语布局、语义、审美的统一通过作者形象得以实现，这个过程中，作者的语言素养和审美思辨意识起到关键作用。尽管维诺格拉多夫反对考虑作家本人的实际生平，切断了真实作家和作者形象的完全对应关系，但显然，创作者的语言素养、审美思辨意识与其生平经历脱不开关系。安德列耶夫曾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担任过助理律师、专栏通讯员和书剧评论员，深入了解过当时俄国小人物的生活苦楚，还受到俄国著名作家高尔基的支持和影响，因此，安德列耶夫在创作该小说时明显流露出了对世纪初社会危机的关心。这与他 1905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支持布尔什维克派的举动是一致的。而安德列耶夫早年间生活穷困潦倒，患有难以治愈的心脏病，在见证革命并遭到打压之后，又在 1906 年失去了妻子，为了躲避政治迫害不得不流亡海外，最后病故他乡。并不顺遂的人生经历与他悲观消沉的性格不无关系，也为《瓦西里·菲维伊斯基的一生》中塑造神秘暗

物、具有生存焦虑的作者形象给出了解释：历经坎坷的作家头顶始终悬着名为抑郁和痛苦的云影，这让他对无形的幽暗存在异常敏感，对生存问题的思考也从未中断。但也正是这种悲观和焦虑的性格，造就了他超乎常人的感受力和想象力（靳戈 1984：6）。

5 结束语

本文选取安德烈耶夫于 1903 年创作的中篇小说《瓦西里·菲维伊斯基的一生》为对象，依托维诺格拉多夫提出的作者形象理论，分析了作品中的话语和叙事特征及其达成的作者形象，进而揭示了小说中表现出的存在主义哲思、在寻神派与无神论之间的摇摆，以及他对现实主义与神秘主义元素的综合使用。可以看出，创作时的安德烈耶夫是一个在世纪末社会危机中发出预警、反对宗教愚信，与同时代俄国人并肩站立的呼告者。这种作者形象与他对社会和哲学问题的关心、消沉忧郁的个人性格紧密相关，也与 20 世纪初俄国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作家本人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契合。

除了维诺格拉多夫的作者形象理论，研究一部小说的作者形象还可以采用巴赫金所推崇的路径，即研究作者-创作者时既需结合文本，同时还需考虑社会现实、历史文化、作者个性和读者接受等具体语境。此时，作者形象理论不仅有助于研究自传体、故事体以及复调小说等特殊文学文本，还可成为系统认识作家创作个性的有力工具——作家的创作史实际就是作者形象的变迁和进化史，这个过程揭示着作家创作的独特特征，反映着作家与同时代人普遍的生活智慧和生存努力。正是这些努力，赋予了作品跨越时空的生命力。

在《瓦西里·菲维伊斯基的一生》中，安德烈耶夫没有选择用文学阐明社会矛盾的形成机制和解决路径，转而着力塑造面对黑洞般的生存困境的人物形象，并关注主体在其中深刻复杂的情感体验，体现出了一种心理存在主义。文本中作者形象表现出的迷茫和动摇没有降低该作品的哲理高度，而是提出了一个更大的命题：如果作为最高超验者的“上帝”离开了，我们又应该到何处寻得救赎之路、寻得高于一切的真理？这个问题普遍存在，且必将经历长期的探索，它使安德烈耶夫的作品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语境中均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而这种跨越时间和文化的共鸣说明，好的文学作品不仅只有优美独特的艺术形象，其背后必定还有一位情感真挚、思想深刻，关注生活中普遍及根本问题的创作者。

附注

1 引自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著，靳戈、顾用中等译《安德烈耶夫中短篇小说集》（1984）。后文征引该书时只用阿拉伯数字标明页码，不再另注。

参考文献

- [1]Виноградов В. Стилистика. Теория поэтической речи. Поэтика[М]. Москва: Изд.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1963.
- [2]黄 玫.文学作品中的作者与作者形象——试比较维诺格拉多夫和巴赫金的作者观[J]. 俄罗斯文艺, 2008(1).
- [3]靳 戈.译者前言.安德烈耶夫中短篇小说集[М].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 [4]李建刚.列·安德烈耶夫研究及其现实意义[J]. 俄罗斯文艺, 2013(1).
- [5]李 懿.蒂尼亚诺夫与维诺格拉多夫“序列”研究的融通与延展[J]. 俄罗斯文艺, 2021(1).
- [6]卢兆泉.安德烈耶夫中篇小说《瓦西里·费维斯基的一生》的审美特征[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1992(5).
- [7]塔塔里诺夫.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1890 年代—1920 年代初)[М].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6.

[8]王加兴. 论维诺格拉多夫的作者形象说[J]. 中国俄语教学, 1995(3).

On the Discourse Characteristics and Author's Image of *The Life of Vasily Fivisky*

He Yu-tao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Abstract: *The Life of Vasily Fivisky*, completed in 1903, was praised by Gorky as Andreyev's most profound, clear and serious work, and Korolenko also called it "a highly artistic work with great power". With delicate and profound strokes, Andreyev depicted the world of Russian rural lif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mpacted the traditional Orthodox faith, God kept silent on troubled Russians' prayers and questions, mysterious aliens quietly surrounded these people, and the desperate voices of the heroes of the novel have become the deafening sound in this environment. The author expresses existential philosophy through the selection of text elements such as discourse, image, and narrative. And the novel not only questions religious comfort with the comprehensive use of realism and mystical elements, but also foreshadows the coming of a bigger storm.

Keywords: Silver Age of Russian Literature; Leonid Nikolaevich Andreyev; author's image; Vinogradov; Bakhtin

作者简介: 何雨韬 (1997—), 女, 汉族, 四川成都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 2024-11-09

[责任编辑: 刘 锐]